上海戏剧学院博士文库

大众文化语境下的上海职业话剧

(1937—1945)

李涛 著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上海戏剧学院博士文库

大众文化语境下的上海职业话剧

(1937—1945)

李涛 著

J809.26
L276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众文化语境下的上海职业话剧：1937～1945 / 李涛著.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10
（上海戏剧学院博士文库）
ISBN 978-7-5458-0499-7

Ⅰ.①大… Ⅱ.①李… Ⅲ.①话剧—戏剧史—研究—上海市—1937～1945 Ⅳ.①J809.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84480 号

责任编辑 计 敏
技术编辑 丁 多
装帧设计 麦 辉

大众文化语境下的上海职业话剧：1937—1945
李 涛 著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 刷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40×965mm 1/16
印 张 19
版 次 2011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58-0499-7/J·122
定 价 38.00 元

编委会

主　任

韩　生

副主任

孙惠柱　宫宝荣

成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丁罗男　王邦雄　叶长海　刘元声　孙惠柱
宋光祖　张仲年　宫宝荣　荣广润　韩　生

总　序

上海戏剧学院院长　韩　生

收入《上海戏剧学院博士文库》的，是上戏近五年来毕业或在读博士研究生的优秀论文。专门为博士研究生出版一套丛书，在学院的发展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这是一个标志，既表明我院提升研究生教育质量的目标在逐步落实，也表明研究生科研能力的培养在我院日益受到重视。

上戏在1998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获戏剧戏曲学博士学位授予权。就我国艺术教育历史来说，戏剧学科的博士学位于1980年代后期才设立，历史虽不长，但基于我国戏剧文化历史的深厚积淀，以及外国戏剧教育的丰富资源，这一学科的博士教育成果是令人瞩目的。戏剧专业高校、综合性大学、研究院等作出的成果和论文大大提升了戏剧学科的学术水平，带动了相关艺术学科的建设，促进了我国文化艺术事业的发展。

上戏最值得珍视的优越条件之一，就是形成了完整的多层次的艺术教育培养系统，从中专、本科、硕士、博士到博士后。就艺术学科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体系来说，层次并不意味着高下，只是不同层次承担了艺术的不同功能，都分别应对了社会的不同需求。这也是艺术学科与其他某些学科的不同之处，艺术的学位并不是阶段性升级概念。

这实际上触及艺术学科规律、大学艺术教育和研究的宗旨、艺术大学存在的根本理由的共性问题。基础性的和前沿性的研究应该是博士生教育所承担的重要使命。艺术呈现的形式和载体具有感官直接性的特点，而艺术学科的重要特点是经验和理论的高度同一性。过去人们对艺术教育的认识更多停留在经验层面，随着艺术学科的渐趋成熟，我们愈发会触及艺术最深层的哲学意义，会追溯某种艺术现象的历史源头。

博士研究生教育，其学术水准与研究能力的提升，本是当仁不让的首要任务。但是毋庸讳言，近些年学术界的浮躁和浮夸之风甚为普遍，我们也看到，学位教育受到不同程度的干扰甚至污染。在这样的背景下，以十年寒窗的姿态，静心于学问的学子，需要应对的诱惑常常会构成对他们承受力的考验。

也正因为此，我们精心挑选的这 11 篇优秀博士论文以丛书形式出版，其目的不在于完成一个展示性的项目，可以视作对于 11 名博士研究生的一种褒奖。我们希望以此开始，倡导一种更加纯粹的学术精神，更加执著的学术追求，更加扎实的学术态度，更加强烈的使命意识。

我们在诸多的博士论文中挑选出的这 11 篇论文各有特点，但一个共同的遴选要求是，必须有自己独到的学术见解。11 篇博士论文，涉及中国话剧史论、中国戏曲史论、外国戏剧史论、西方戏剧文化研究、舞台设计与演出研究、编剧理论与创作、表演与导演研究以及人类表演学等多个研究领域，其中有的从独特角度解读中国戏曲的发展，有的在全新背景下对中西方戏剧文化交流进行阐述，既有从古

代剧场发展角度对舞台美术理论的探讨，也有对经典西方剧作家创作理论的钻研等等，透过 11 篇论文，我们可以从中感受到各位博士生在撰写过程中的艰辛和努力。

李涛博士在论文《大众文化语境下的上海职业话剧（1937—1945）》中，认为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话剧在上海更多的是作为大众文化产品存在的，它的消长虽然有社会形态变迁、行政管理的因素，但主要是市场之手在操控。李涛博士在研究中更多地依赖一手文献，并结合对部分当事人的访问，对某些疑点加以廓清，在论述中适度引入西方大众文化、文化研究理论，力图准确揭示上海职业话剧的发展规律，考察其如何成为大众的消费品，如何影响上海的都市生活，重新绘制了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话剧地图。

邱佳岭博士以《论汤姆·斯托帕德文人剧》为题，通过对斯托帕德戏剧不同时期主要文本的具体分析，以精细文本分析为依托，对斯托帕德戏剧从选材、剧情结构、思想意义几方面来阐述斯托帕德文人剧的特质，并作出整体性界定和分析。刘欣博士在《论中国现代改译剧》中，提出在中国现代话剧发展的历史中，伴随着外国戏剧的译介，出现了大量的改译剧，随之涌现三个高潮，即文明戏时期、1920 年代、三四十年代，并对三个高潮做了条分缕析的阐述。

易杰博士在论文《萨拉·凯恩：从存在的悲剧到后现代悲剧》中提出，萨拉·凯恩前期戏剧作品中通过展示种种残酷暴力的舞台形象，展现了主体在一个变幻莫测的客体中，身体和情感经历了来自未知客体的种种痛苦的折磨后而体验到的一种存在的绝望，并对其晚期戏剧中存在的绝望达到浓郁程度及戏剧的客体世界却消失了的现象进行追踪，认为在这个过程中，萨拉·凯恩所采取的是视觉震撼和对现实主义戏剧结构的解构从而一步步走向后现代的戏剧形式。易杰博士为获取第一手资料，甚至远赴美国。

宋旸博士以《宋代勾栏形制复原》为题，从中国最早的商业剧场——勾栏（又作构栏、勾阑、钩栏、构肆）着手，认为勾栏在宋代的出现具有跨时代的意义，标志着中国戏剧已经发展到成熟阶段，进入商业市场。他通过考察现有资源，复原宋代的戏曲演出场所——勾栏，结合《营造法式》、《清明上河图》等历史文字、图像资料与金元时期的戏台文物资料，对勾栏中的戏台各局部构件、院落规模及尺寸进行全方位的复原，得出勾栏并未消失的结论。

刘庆博士的《上海滑稽史》，是对20世纪初至今上海滑稽历史的回顾与讨论，以时间线索串联分析过程，尝试辨析了不同滑稽形态的演进和变化情况，并对滑稽表演的风格特性、地域色彩、创作方式、美学价值等问题展开了阐述。刘庆博士在论文中力图将不同滑稽形态之间的相互渗透纳入视线，进而期望准确完成对滑稽动态历史的勾画。

姚旭峰博士的《士文化的一个样本——明清江南园林演剧初探》，以明清——主要为明中叶到清中叶——江南园林演剧为研究对象，探讨其历史成因、文化精神和主流形态。与之相应，徐煜博士以《近现代戏曲名角制文化研究》为题，主要论述的是戏曲行业状况的演变条件和过程，名角制的表现形态以及近现代以名角为中心的演出经营模式等问题，希望比较全面地概括名角制的内涵和体现方式。

赵起博士在《后工业时代的想象天堂——对美国近40年幻想题材影片创作的"非现实化"特色的研究》中，以美国近40年幻想题材影片创作的"非现实化"特色为研究对象，从"非现实化"处理的基本思维（创作观念的演变、主题的选择）和创作中的具体特色这两大部分来展开研究，考察了"非现实化"创作观念的来源、形成，主题的类型及特征、叙事、风格和受众心理等方面的论点，涉及了诸如1960年代后美国电影产业基本状况、电影业的全球化战略及市场运作、叙事

时空关系、“末世情结”等一系列问题，期许在理论上建立一个较有新意的讨论话题。

黎力博士的《否定之否定：长阳土家族“跳丧”仪式的研究》，认为长阳土家族“跳丧”仪式演变而来的各种形式并未因为否定和改变而消失，反而是在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中不断优化、发展，逐渐适应现代生活。黎力博士的初衷是探究特殊民族传统仪式的剧场演变，并期望在探究中思考仪式剧场在现代社会中的发展前景，以及现代城市居民社会生活中的需求。

以上见解或显稚拙，或有待继续论证，但选题都体现出一定的开拓性。每个博士为之遍寻资料、踏访调研的付出是实在的，因此基本上可以作为我院博士研究生教育教学近五年来的优秀学术成果。

因为时间关系，并非我院所有的优秀博士论文都可入选。我们出版《上海戏剧学院博士文库》的意义也不全是为了纪念，更在于它的引领作用。我们期望，随着我院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和质量的提高，会有越来越多的优秀学术成果出现。

是为序。

2011 年 5 月

序

上海戏剧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丁罗男

在我指导过的博士论文中，李涛博士的《大众文化语境下的上海职业话剧(1937—1945)》实给予我深刻的印象。这不仅在于他攻博及写作学位论文期间的刻苦与勤勉，更因为他在学术研究中的那股锐气和创新精神。这在当今许多硕士、博士论文已经习惯于做资料的归纳、整理和综述的情况下，尤其显得难能可贵，是值得赞誉和发扬的。

所谓学术研究的创新，我以为无非表现在选题新、观点新、方法新和资料新四个方面，而李涛的这部专著在这几方面都力图有所突破，写出新意，也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果。

首先是选题上的独辟蹊径。中国话剧在抗战时期达到了空前的繁盛，代表性的三大地区就是以重庆为中心的西南大后方、以延安为中心的根据地，以及“孤岛”与沦陷后的上海，这是戏剧学界的共识。然而，在以往的话剧史书中，重庆话剧因继承着“五四”及“左翼”的斗争传统，得到高度的评价和多方面的研究；延安的话剧活动虽显稚嫩

和粗糙,却也在“革命化”和“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上受到充分肯定。唯独上海这八年的话剧,因为与“商业化”连着,要么遮遮掩掩,一笔带过,要么干脆用“畸形的繁荣”一言以贬之。这无疑是传统的“左翼”思维方式造成的僵化后果,正如李涛在引言中所指出的,过去大量的话剧史书,“对一些与当时文艺政策抵触的现象,如商业化,或回避、或否定,对一些舞台演出影响不大的作品,因为内容‘进步’,则从文本立场大加宣扬,呈现一个不真实的、扭曲的话剧史”。

中国话剧与职业化、商业化确曾几度纠结。早年上海的文明戏在恶性商业竞争中堕落,终致身败名裂。针对这一教训,“五四”以后大力倡导“爱美的”戏剧,用业余的、非营利的小剧场方式推行新兴的现代话剧。然而,一种戏剧的成熟终究需要职业化,于是 1933 年唐槐秋创建“中国旅行剧团”,重新迈出了职业话剧的步伐,但这一可贵的尝试也因为其非“左翼”的面貌和较浓重的商业化气息,长期来饱受争议,评价偏低。抗战爆发后,上海话剧人在“此时此地”(夏衍语)特殊的环境中开展剧运,自然以职业化作为他们的旗帜,但职业化又必然导致商业化,对商业化存有戒心的左翼人士仍然闪烁其词、讳莫如深,一方面身处其中,一方面又竭力撇清与商业的关系。倒是亲历其境的戏剧家李健吾在战后一次“文艺检讨座谈会”上说出了实情,也算是对战时上海话剧商业化的一种辩护。他说:“当时剧本的出版是无须审查的,演出才须审查。说来也很好笑,到了抗战后期,许多汉奸鉴于局势不同,竟有以投资演出富于正义感的话剧电影,来谋赎罪的投机观念。所以,有许多戏原来不与敌伪勾结的人不敢演出,很多倒是由汉奸支持而演出的。因此,在沦陷期间,其他文艺部门充满了汉奸气息,惟有话剧倒很多值得一看的。……一切都商业化了,我们都作为剧团雇员。当时内地有人指摘我们流于商业化了,但是,沦陷区中的剧团若不商业化而政治化,只有与敌伪汉奸勾结‘政治化’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了。”(《上海文化》第 6 期,1936 年)这番解释似乎比较有力,可终究还是强调了话剧商业化是战时政治语境下的无奈之举。到了建国以后,商业化便完全等同于资本主义化的概念了,而文化艺术领域里的“商品”简直就是堕落的代名词。

尽管随着时代语境的变化,学术思想的逐步解放,历史研究的“禁区”也一个个被打破,但毕竟上海这段历史时期的话剧是在一个非常复杂的政治文化背景下繁荣起来的,迄今学界对它的了解、研究还很不充分,加上话剧商业化本是一把双刃剑,成功背后不免滋生种种弊端,“乱花迷眼”,要廓清其面貌、还原其真相,确有相当的难度。但是,李涛在决定研究课题时,并未避重就轻,选择容易一些的题目,做大同小异的文章,而是敢于蹚一蹚“浑水”,试着重新绘制一幅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话剧地图,这显示了作者高度的学术敏感与胆识。

从政治的视角转向文化的观照,是本书又一大学术亮点。摆脱了诸如“全民抗战”、“左翼的战斗传统”等狭窄的视野,甚至不是就事论事地谈论戏剧自身,问题似乎豁然开朗了许多。作者尝试用近年来越来越受重视的“城市文化”理论,来解释这段时期上海话剧的繁荣,在观点与方法上都颇具新意。也就是说,当时上海商业性话剧的兴盛,不仅出于政治的逼迫,更有其深层的文化发展的原因。为突出文化而非政治的语境,书名也用了“1937——1945”来标明时间段,而不是常用的历史概念:“抗战时期”。作者认定在这一阶段里,“话剧在上海更多的是作为大众文化产品存在的,它的消长虽然有社会形态变迁、行政管理的因素,但主要是市场之手在操控”。如果从近现代上海城市中孕育和发展的大众文化角度来看,这一论断应该是正确的,也是合乎历史事实的。

大众文化理论告诉我们,近百年来,随着城市现代工业与商品经

济的飞速发展,以市民阶层为主体的消费群体逐渐形成,文化也从少数精英分子的审美对象,转变为完全具有公共性的大众消费形式。而上海作为中国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城市,大众文化从1930年代初开始就浸润、弥漫于电影、小说、戏剧等领域。抗战爆发后,特殊的"孤岛"及沦陷环境,更是把上海"摩登"文化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由于电影业、出版业受到压制和破坏,美国影片遭禁,国产影片的制作又为敌伪所掌控,其他如畅销文学、时尚报刊等情况也差不多,战前上海业已形成的大众文化消费市场一时间大大萎缩,庞大的市民消费群体急待一种新的娱乐文化产品来满足他们的需求,于是,话剧以它相对低廉的成本和迅速的收效,还有它与电影的紧密联系(比如剧影双栖的"明星"),很快填补了这座城市的文化市场空缺,同时给处于困境中的市民阶层以精神的慰藉与心理的代偿。与此同时,"孤岛"时期来自周边地区的大量游资进入上海,商业界伺机投资话剧产业,成立剧团或资助演出,也对话剧的繁荣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本书以丰富翔实的资料和全面周到的分析,为我们描述了当时话剧之所以崛起,甚至超过电影、戏曲的主客观原因,即整体的大众文化语境。这在以往论及上海战时话剧的著作中很难见到,囿于时代的局限,即使从当时走过来的前辈如于伶、柯灵、李健吾等人的回忆文章,也是缺乏这种大视野和新视角的。

不仅如此,作者还运用哈贝马斯关于"公共领域"的理论,进一步深入探讨了当时作为大众文化主要代表的话剧剧场,在营造城市公共性文化空间中的重要性。反之,也正是现代意义上的剧场公共领域,对话剧的发展与繁荣起了决定性的推动作用。作者在书中写道:

> 剧场是都市的文化器官,华灯初上,人们走进剧场,在艺术气氛中交流,并获得愉悦。剧团是城市的精神代表,公共领域的

重要参与者，大众文化产品的制造者。艺术家在舞台上传播思想，创造风气。而戏剧评论所呈现出的独立性、公共性、批判性等特点，更表明了上海大众文化的现代程度。三者构成了公共交往与公众舆论的基本空间。

按照哈贝马斯的观点，社会文化生活中的“公共领域”是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场所。在欧洲，从贵族代表性公共领域到资产阶级代表性公共领域，本质上就是一个逐步走向自由、开放和民主社会的进步过程。所谓公众舆论和普世价值是在这样的公共空间里形成和传播的。起先为文学的社团、沙龙和咖啡馆，进而发展到更大的文化空间，人们讨论的议题也从文学到政治，直至整个文化生活，参与者从知识分子逐渐扩大到中产阶级及普通市民阶层。

作者凭借着这一视角，又结合大众文化理论，考察了当时话剧剧场的特殊意义和功能。显然，话剧的观众不同于以旧式文人和文化程度不高的小市民为主体的戏曲，而更接近现代意义上的大众文化接受者与创造者，包括知识分子与一般市民群众。正是话剧，成了电影缺席情况下“高雅而又通俗”的大众文化消费品，各种人在话剧剧场中模糊了自己的阶级区分，共同确认了“时尚”文化消费者的身份。他们不光是在这里进行娱乐休闲，并且在这种开放和民主（当然有限度）的公共空间里进行交流、讨论，形成某种公众意见和舆论。有趣的是，当时的报纸杂志等媒体也开始围绕着话剧做文章，除了商业化的包装、炒作外，也积极参与这个公共领域的建设，不仅大量刊登评论家颇为独立、公正的批评，也时常发表来自观众的种种意见。上海文化的公共领域和社会热点主要已不在时髦影片或流行小说了，像张爱玲这样的当红作家，竟然也对话剧发生兴趣，亲自改编了自己的小说《倾城之恋》搬上舞台，就可以想见当时话剧这一公共空间具有

怎样强大的吸引力和凝聚力。

在以话剧剧场为核心的文化公共领域里，大众文化的另一个奇特功能也得到了充分发挥，那就是对现行政治宰制性力量的规避，以及对精英文化与通俗文化之间鸿沟的消融。话剧演出看似远离政治的内容和商业化的运作方式，让敌伪当局失去了干预、操控的理由，而广大观众则从中享受到了精神宣泄和愉悦，以支付的方式换来他作为大众一员的发言权。尽管有政治造成的某种扭曲，有商业化带来的某些弊病，但应该说在这块由剧场、剧团、观众、媒体、评论界共同构成的文化公共领域里，基本上形成了一种良性的互动关系，而不是所谓的“畸形的繁荣”。究其原因，诚如书中所指出的，当时一批有头脑、高素质的艺术家如黄佐临、费穆、李健吾等，既对大众文化及“公众舆论”表现了尊重，又不乏积极的审美追求；还有一批懂得艺术、持论公正的批评家如麦耶、关露等，对职业话剧的创作倾向起着“监督”和引导的作用，这些都使职业话剧保持了健康发展的态势，从而避免重蹈文明戏堕落的覆辙。虽说战时八年上海话剧的普及和繁盛有其一定的特殊性，与今天的语境显然不同，但在当代大众文化又一轮热潮来临，话剧重新走向市场之际，充分研究和适当借鉴历史的经验是不无启示的。我想，这也就是李涛博士这部论著的现实意义。

最后，还要提一下本书在材料方面的出新。由于作者突破了过去戏剧研究集中于作品文本分析的模式，把当时上海职业话剧放到一个更大的文化背景上加以考察，把编导演人员、投资经营人员和广大市民观众融为一体，都纳入研究范畴，因此全文呈现出新的叙事格局。比如，对整体文化市场的分析，对剧场经营和剧团运作情况，甚至对报刊媒体与舆论的关系等，都设有专门的章节进行论述。这就需要从尘封的历史中发掘大量的第一手资料，而作者在这方面做了许多艰苦细致的工作。就我所知，他在写作期间，跑了多家图书馆、

档案馆、剧场和剧团的资料室，光查阅《申报》等当年报刊就花费了数月时间，有时候一张一张地翻阅报纸，一天也找不到多少有价值的材料，但他并不灰心，继续寻找线索，终于有所收获。即使引用现有的二手资料，他也是有所鉴别和取舍，不肯人云亦云。相比之下，现今不少青年学者包括博士生往往心气浮躁，耐不住寂寞，缺乏这种严谨和刻苦的治学精神，写文章惯用二手资料，东抄西摘凑成一篇，论文的质量也可想而知。为了弥补馆藏史料遗轶的缺憾，给论著增加更多真实而又感性的素材，作者还采用“口述历史”的方法，走访了胡导、洪谟、乔奇等当年亲身从事职业话剧的前辈老艺术家，将他们的回忆记录成文，既给论著补充了新鲜的例证，又为后来的研究者留下了一份可贵的史料。这种求真务实的“田野调查”式的研究方法，也是值得在文化史、艺术史研究领域里大力提倡的。

这次李涛博士的论著经过修订，还增添了一些珍贵的照片资料，即将正式出版。我相信它会引起更多读者和学术界的关注。虽然本书也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比如在论述大众文化与话剧商业化的负面现象方面，似可进一步深入；少数章节显得资料有余而理论阐发不够，等等。但这并不影响它作为一篇优秀博士论文的价值，因为最可贵的是，作者做了一件开创性的工作，走出了“职业话剧”研究领域的一条新路。我衷心希望他继续这个有意义的探索，在不久的将来为我们奉献更多更出色的学术成果。

2011 年 9 月

目　录

引言　对象的提出和研究方法 …… 1

第一章　“此时此地”：泥淖中的剧运 …… 9

第一节　消费之都的经济、文化与政治 …… 10

第二节　戏剧产品与大众的日常生活 …… 18

一、“爱美”与“职业”齐头并进 …… 18

二、“代偿心理”引发热情 …… 20

第三节　通往商业化之路 …… 25

第二章　作为大众文化的戏剧生产 …… 53

第一节　市民社会与审美嬗变 …… 54

第二节　戏剧生产体制 …… 59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